

社会治理新实践系列报道③

探索海上治理新模式

舟山：打造“海上枫桥”升级版

方敏 徐博龙

眼下,正值冬汛捕捞旺季。浙江舟山最大的渔港——普陀区沈家门渔港,百余艘大小渔船鸣笛进出,秩序井然。码头上,渔民们正忙着卸鱼货、补给养,忙碌却不杂乱。

“早几年的这个时候,各地的几千艘渔船在渔场作业,争相捕捞捞杆,网具损毁、船舶碰撞等纠纷可没少见,近几年明显少了。”码头的一边,忙着往船上补充给养的浙普渔64110“船老大”周日戴感叹。

下海捕了20多年鱼的周日戴是沈家门街道带头“船老大”,也是普陀区海事渔事义务调解员,他有个特别头衔——“海上老娘舅”。

50多年前,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出“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党的十九大会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如今,浙江舟山创造性地将“枫桥经验”嫁接到海上,闯出了一条极具海岛特色的“海上枫桥”之路。

形成海、陆、空立体快速处警网络

喊话、打绳、靠泊等一系列常规动作完成后,海警李继跟战友登上了一艘渔船,开始对船员逐一进行身份对照,并仔细检查船上的渔网是否合规。

李继是浙江海警第二支队二大队民警,平时打交道的多是渔民。渔民发生纠纷,他负责调解;渔民违规作业,他前往制止;渔民上法院,他提供咨询。

近年来,由于“船多鱼少”的

矛盾日益突出,每到冬汛捕捞旺季,浙北渔场集聚了来自各地的渔船3600余艘,不时发生因争夺捕捞区域、渔船碰撞等引发的治安事件。

2017年9月30日,一件跨区域群体性渔事纠纷事件就发生了。“一得到消息,我们就与公安、海事、渔业等涉海执法单位组建联合应急处置小组,第一时间赶赴事发海区,劝阻渔民保持理智。经过一昼夜的努力,双方同意回港后协商解决渔事纠纷。”海警二支队二大队负责人胡海建回忆。

这起渔事纠纷事件的成功化解,得益于当地首创的“3+4”海上治安管理机制。普陀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李朝晖说,过去,海上执法各自为政,影响了执法合力的形成。为此,当地建立了海上“一警一艇一艇、联席、联动、联调、联同”的“3+4”治安管控工作机制,以区海洋与渔业局为龙头,以公安、海警、边防、港航、海事等涉海执法部门为主力,组成海上联合执法船队,加强重点港港口、航道锚泊点、纠纷多发海域、治安乱点部位等的巡查,形成了海、陆、空一体化的立体快速处警网络。

沈家门渔港共有大小码头27座,长期停泊有各类船只2000余艘。一到休渔季,进港停泊渔船近万艘,因停泊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频发。2014年,普陀区探索实施“海上停车场”式船舶管理模式,边防、海事、渔政、港航等职能部门联动,借鉴陆上划车位的管理模式,在渔港里划分区域,对船舶停靠方向调整。模式实施以来,沈家门港区因抢船位引发的矛盾纠纷同比下降达70%。

实现海上安全“智能化”

冬至前后,正是东海带鱼最肥美的季节。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信息指挥中心一派忙碌景象,窗外的沈家门渔港,渔船往来穿梭,马达声声。

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渔政渔监站长陈岷站在指挥中心大屏系统前,注视着各码头、港区、水产养殖区域的实时监控视频。

正值冬汛捕捞生产繁忙季节,又是大风、寒潮等恶劣天气多发期,在远离陆地的渔场上捕捞的渔船是否顺利?陈岷掏出手机,通过“海上互联网”系统,与80海里外一艘渔船的船老大进行微信通话,并让对方发来一段海上实时视频。

“目前海上互联网能覆盖200海里内的范围,通过微信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实现海上纠纷不‘登陆’。”陈岷说。

浙普渔64110号船老大邱金章是一名渔船网格员,手上配备了一台“海上网格平安通”,平时遇到港区航道被违规停泊渔船占用等问题,他就拿出“网格通”联系沈家门街道安丰渔民服务中心,“用不了多久,问题就能解决。”邱金章说。

普陀将全区渔船划分254个海上网格,落实286名网格员,配备32台“海上网格平安通”,采集报送30海里以内各类信息。而30海里以外无线号区域,由网格员依托卫星电话,将信息实时上报渔业站、服务站网格员进行采集报送。

据沈家门街道安丰渔民服务中心主任袁国光介绍,他们可以根据“网格通”反映上来的信息,及时将问题提交到相关部门,使各类海上问题第一时间得到发现和处。

岱山县高亭镇共有渔船408艘。高亭镇以村级为单位,建立了渔老大微信群、渔嫂微信群等多个微信平台,每个微信平台里都有社区村渔业专职安全管理员,不时地将与渔民相关的安全生产、渔业政策、各类指令等信息上传到微信。

针对海岛实际,在六横、衢山等海岛,公安部门建起了集信息采集、人车管控、社会治理于一体的全时空治安防控网。不久前,在六横打工的一名外地小伙无故被3个人打伤,警方根据智慧岛可视化系统,迅速锁定一名嫌疑人,并顺藤摸瓜将其余两人抓获。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海上社会治理体系

天蒙蒙亮,岱山县衢山镇船老大颜永武就驾驶着浙普渔03234出海了。临近元旦,他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收成。岱衢洋曾是东海大黄鱼的故乡,在颜永武的记忆里,一到生产旺季,江浙闽沪渔船云集,大黄鱼捕捞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95%。

由于过度捕捞,现在大黄鱼濒临绝种。休渔减船、养护海洋渔业资源,成为当地政府和渔民的共识。

浙普渔03234号船的驾驶室外的正上方,贴着红彤彤的“瀛洲红帆”标志,老远看去,格外醒目。衢山镇共有渔业村社22个,

有各类渔船842艘。像他这样的命名“瀛洲红帆”的渔船,目前共有20艘。

“多了一个标志,就多了一份责任。在环境保护、矛盾调处、抢险救灾等方面,就得做在前头。”颜永武说:“我们将象征党建的‘红帆’标志搬到船上,就是为了在处理矛盾纠纷、文明守法、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带头作用,铸就坚强的海上堡垒。”争创“瀛洲红帆”,有一定的准入条件:渔船船长或船东为党员,所有渔业证书齐备且有效,近三年内未发生渔业安全事故,积极配合安全检查、面对面安全教育及渔船点验工作等。一旦申请成功,船只能享受部分渔业管理信任授权、政府渔业“科技兴安”设备优先保障、最低利率的银行贷款申请等权利。

嵊泗县从各乡镇党员代表、人大代表、在职或离退休干部、渔民船老大中选聘29名“渔业前线观察员”,经常深入渔村、渔户进行调查,倾听群众呼声,及时反馈情况。

定海区组建“1+2+N”模式(即1名民警+2名社区干部+若干治安积极分子)的海上群防群治队伍,加强港区码头的治安巡逻,并挑选部分有威望、经过培训的船员作为远洋作业渔船的治安协管员。

2016年,舟山群众治安安全感满意率为97.73%,位居浙江省设区市第一。2017年1月至11月,全市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35.8%。

“打造‘海上枫桥’升级版,就要依靠群众,鼓励渔民区群众、社会组织参与平安海区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海上社会治理体系。”舟山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委副主任夏凯慧说。



岁末年初,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开展“百日出击”专项集中执行行动,严惩“老赖”。图为执行到位后,法院干警为8名申请执行入集中发放执行款。阮传宝摄

北京西城法院金融街法庭

审判,为金融风险预警

李艳红 刘白露

北京市西城区广成街4号,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人民法庭所在地,出门向北600米,右手边是中国证监会,左前方是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从法庭出门向南步行到央行总部,最多不过10分钟路程。

北京金融街是首都金融主中心区,“一行三会”和近2000家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及企总部汇聚于此,资产规模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40%,是全国一平方公里高端产业最聚集、创造价值最大的区域。2017年9月26日,西城法院金融街法庭正式入驻金融街,审理辖区内涉银行、证券、期货、信托等金融类商事案件。

“除了比较常见的金融类案件,大量新类型案件在不断挑战法官的司法能力。”金融街法庭庭长刘建勋总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还有一些案件,看起来不起眼,但往往与国家金融监管、金融决策直接相关。

安徽股民陈先生起诉一家上市公司,认为自己受公司误导购买股票而产生损失,以

证券欺诈为由要求赔偿。2016年,被告公司募集一笔30亿元的永续债,募集成功后,将30亿计入公司权益,并在季报中公开。陈先生赶紧买入股票,却没有等来涨停。他反复研究公司季报和会计报告,查询了专业书籍,认为被告公司构成欺诈。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永续债是一种成熟的金融产品,2013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永续债在会计账目里应该列为权益还是负债,我国并没有对此予以明确,实际操作中也不统一。主审法官佟颖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案件,如果规则不明确,有可能产生大量同类纠纷。经过合议,佟颖立刻深入各个相关部门进行调研。

“在我们审理的案件中,有把茶叶包装成金融衍生品来炒的,有大量P2P的,还有一些涉及独立保函、通道业务的案件。金融创新非常快,当风险控制能力不能同步匹配时,就会以诉讼形式来到法院。”青年法官高亢深有体会。合议庭法官挤时间学经济学、金

融学等领域专业知识,随时准备接受新类型案件带来的挑战。

在涉金融行政诉讼领域,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以“一行三会”等为被告的涉金融行政案件迅速增长。作为北京市唯一审理涉金融行政案件的基层法院,西城法院共审理此类案件209件。“近几年,这类案件数量在以前20%的年增速上升,我们正在和证监会沟通,准备就证券期货行政处罚的非诉执行案件审查建立绿色通道。”法官曹智桥说。

“金融街人民法庭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庭,它在发挥审判职能、进行风险预警、参与决策制定等多个方面承担着独特的使命。”西城法院院长蔡慧永说,与金融街法庭同时入驻的,还有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通过研判分析金融审判司法大数据,及时发布金融法律风险预警信息,着力将金融街法庭打造成集金融审判实务平台、金融司法研究平台、金融法律风险信息发布平台于一体的全新高地。

记者手记

1949年,当信息论之父劳伦斯·香农将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信息量最大载体时,他也许无法想象,如今的人类社会已迈入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海量的信息生产和互通,正逐步打破时间限制、地域阻隔和阶层分野,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平。

然而,互联网引发的时代变革并非“一马平川”,它同时还“沟壑纵横”。正如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一位嘉宾所说:“互联网带来的数字红利没有得到广泛分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然广泛存在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数字鸿沟的产生,首先在技术和设备上的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随着网上购票越来越普及,都市白领们只需滑动手指或敲击鼠标就能轻松订票;而对一些外来务工者或老年人来说,学习上网本就不容易,网上购票这一“技术活”就更难掌握了。此外,网上购票还要比拼谁的网速更快、手机或电脑更好、插件更强,在这些方面,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较大“鸿沟”。

除了技术和设备上的数字鸿沟,观念上的数字鸿沟同样值得重视。数字信息天然具有的交互性和共享性,决定了只有在互联互通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价值。然而,一些数据拥有者既不重视数据开放,也不关心其业务之外的数据需求,甚至将数据视为个人财产,希望以此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或主导权。正是这种观念上的数字鸿沟,让许多数据彼此割裂,形成一个“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这不利于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也影响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使得一些群众难以享受更全面便捷的信息服务。

未来的信息鸿沟,并不仅限于技术、设备和观念的差距,更在于有能力筛选有用信息并创造知识的人,与只会被动接收信息而无法形成有效知识的人之间的鸿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享受着空前充分的信息选择自由,也面临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选择困惑。事实上,对信息的筛选能力,已经成为关乎个人成长发展的重要能力。对此,我们要转变意识、提升能力,从无心选择变为用心选择,从不会选择变为擅于选择,从单纯获取信息变为创造有效知识。

信息的价值在于流动,网络的意义在于互联。消除互联网发展道路上的数字鸿沟,让信息高速公路通达千家万户,这也是共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题中应有之义。

消除发展道路上的「数字鸿沟」

世界互联网大会采访札记之二

倪弋

深圳宝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守住公正的最后防线

本报记者 杨倩

在深圳宝安务工多年的王原(化名),参加一次工友“生日聚会”,不成想3天后自己却作为强奸疑犯被公安机关拘捕。一方面,他坚持不认罪,一方面案件进入流程,检察机关对他提起公诉。

案件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承办法官陈庆涵与合议庭发现证言间多处自相矛盾,看得出侦查机关仅作了表面侦讯,有罪证据间不能形成完整锁链。经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层层讨论,最终在审判委员会多数成员支持下,宣判王原无罪。在法槌敲响那一刻,王原当庭落泪。

这是宝安法院落实“以审判为中心”推进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案例。近两年来,宝安法院探索建立一系列机制,确保审判质量,防范冤假错案,倒逼公检法系统谨慎用权。

案件进入宝安法院,就自动进入了案件质量控制体系:第一关,让“老医生断疑难杂症”。宝安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一直居于全国基层法院前列,而刑事审判一线法官仅有17名。为此,宝安法院试点“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探索刑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就好像感冒等小病走简易门诊,疑难病症让资深专家会诊。”宝安法院院长马文权说。第二关,充分庭前准备和重点案件判前报备。重大疑难案件中,公诉人、被告人和辩护人意见、控辩双方证据材料和争议焦点等,在庭前会议中充分展示,提高庭审质效;个案充分放权后,为防止监督弱化虚化,特定案件必须提请庭长监督。第三关,由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提供审判指导。每遇疑难,或合议庭意见分歧较大,便交由主审法官会议讨论,仍有较大分歧,合议庭可提交刑事专业法官会议。第四关,审判委员会对关键问题把关。对可能判处无罪的案件一律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建立科学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最大程度避免错案。第五关,严格评查。宝安法院组织资深法官,对发回改判案件实行评查全覆盖,评查结果计入法官实绩档案,纳入年终考核。

“以审判为中心不是‘以法院为中心’,需要公检法之间配合支持、协同联动。对于可能判处无罪案件,宝安法院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2016—2017年共邀请检察长等参加讨论84次,建立良好互动机制。宝安法院在做出无罪判处后,对于社会反响较大、问题多发的,提请政法委召开联席会议,就类案处理机制和侦查公诉重点与公安、检察机关沟通。”

“以审判为中心”的落地落实,倒逼司法队伍法治意识不断提升。宝安法院刑事审判法官多次受邀到市区公安机关,为办案民警进行涉黑、毒品、诈骗等案件培训。宝安公安机关特别是龙华分局,将办案民警旁听所办案件庭审制度化,2017年共组织民警127人次旁听了32场庭审。

本版责任编辑:徐隽